

科普特问题

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科普特问题

段九州

摘要：政治庇护主义是政治家们向民众提供利益和保护以获取后者政治支持的互惠关系。作为埃及最大的少数民族，科普特问题是埃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穆巴拉克时期，民族民主党政府通过强化科普特东正教会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以换取后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形成了与科普特社群稳定的互惠关系。本文从政治庇护主义视角切入，总结出埃及政府教会科普特社群三边关系中的政治互动模式。

关键词：埃及；庇护主义；科普特问题

作者简介：段九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5)05-0080-1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执政期间，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一直面临多重势力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其中包括其他党派对议会席位的争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武力和舆论攻击，以及西方国家对他打压国内反对派的批评。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穆巴拉克与国内多个重要社会群体建立起了庇护关系，他利用执政党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向被庇护群体提供他们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被庇护群体则被要求支持执政党和穆巴拉克本人的合法性。通过维持渗透到埃及社会各阶层的垂直性庇护权力关系，穆巴拉克成功地建构了民族民主党在执行层面的政治权威。

穆巴拉克的长期执政塑造了埃及政治文化的庇护主义特征。2011年“1·25”革命后，占据权力垄断地位的民族民主党被解散，而其后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不具备向埃及社会提供资源的能力，政治庇护关系濒临破裂，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失衡导致了埃及政局持续动荡。2013年7月，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后，其执政模式仍以穆巴拉克时期的政治庇护主义为特征。本文通过梳理穆巴拉克政府与埃及科普特社群的关系，分析埃及政治

庇护主义关键要素和行为框架,以此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埃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一、庇护主义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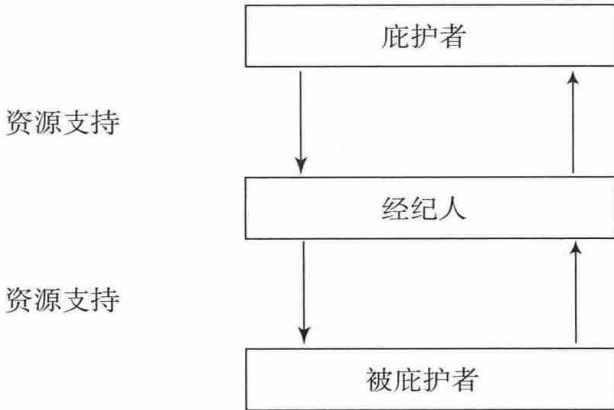
庇护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提出,用来描述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的庇护者(patron)与被庇护者(client)之间的等级关系。这一关系涉及庇护者向被庇护者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而被庇护者向庇护者回报以经济资源、服务(如租金、劳动、谷物)以及社会服从、忠诚等。庇护关系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交换逻辑,即庇护安排是一种非对称的、却是相互有利的、公开的交换方式。^①按照斯各特的经典定义,庇护关系是指一种角色之间的交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涉及双边的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作为回报。^②

尽管庇护关系通常描述成一种双边关系,但它并不排除中间方或经纪人的存在。因为庇护关系不一定是双边的、单方向的,它也包括一种多边互惠的网络,其中可以涉及多个交叉的交换关系。根据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一些庇护者在另一种庇护关系中 can 成为被庇护者。这样,在庇护关系结构中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庇护者——经纪人——被庇护者的三边结构。经纪人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间接交换中作为桥梁,虽然无法控制交换的内容,但可以影响交换的方式和结果。在更多的情况下,经纪人本身也加入庇护关系结构而成为其中的一方,作为上一级的被庇护者和下一级的庇护者。经纪人拥有自己的资源,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向社会底层群体提供庇护,同时又将社会底层群体及其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从上一级的庇护者那里获得恩惠。^③在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或庇护主义通常被描述成政治家们向选民提供物质好处以获取政治支持。这种交换既可能发生在传统庇护主义关系中面对面的交往,也可能发生在选民与政党、官僚机构或国会议员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中。

① E.N. Eisenstadt, Louis Roniger, "Patron-Client Relations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1, 1980, p.42-77.

② James C.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No.2, 1972, p.86.

③ 陈尧:《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一个分析的范式》,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



二、埃及科普特问题的历史源流

阿拉伯世界以多族群、多教派共存著称,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科普特人是古代埃及人的直系后代,在公元一世纪信仰基督教之后,他们创造了融合古埃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科普特文明。科普特东正教会,又称埃及亚历山大教会,是由耶稣使徒圣马可(St. Mark)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大约公元 42 年创立,亚历山大和安塔基亚、耶路撒冷、罗马并列为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教会。科普特东正教会的首脑被称为亚历山大大主教(th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他们尊奉圣马可为第一任大主教,后任的大主教都是他的传人。^① 641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标志着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语在埃及地位下降的开始。随着几个世纪的社会同化,大部分埃及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取代了科普特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后者只存留于科普特东正教的宗教仪式中。埃及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科普特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5% 左右^②,其中科普特东正教信徒约占科普特人口的 90%,科普特东正教会则是埃及最大的非伊斯兰宗教机构。

纵观基督教产生以来的埃及历史,科普特族群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庇护关系。特别是在穆斯林占领埃及之后,统治者普遍承认科普特东正教会作为社群代表的官方地位,以利用教会作为间接控制庞大的科普特非穆斯林群体的代理机构。作为国家对于自身合法性承认的回报,科普特东正教会通常会在政治上配合国家立场,并打压社群内部对统治者的反对意见。

^① Ken Parry, ed.,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xx; Blackwell Publisher, 1999, p.129-131.

^② Qscience connect, *Characterizing the Copts in Egypt: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Health Indicators*, Doha,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qscience.com/doi/pdf/10.5339/connect.2013.22>.

然而,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远非稳定,埃及国内教派主义是穆斯林统治者和基督教宗教机构之间冲突的永恒导火索,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宗教包容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关系。同时,外部因素也会强化或削弱双方的关系,比如中世纪西方十字军东征间接导致了埃及统治者对基督徒的普遍歧视和打压,而在纳赛尔时代,当埃及面临西方列强和以色列军事威胁时,教会与国家则立场统一,共同抗敌。

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期间,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埃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主义浪潮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双方因为面临共同的政治和安全威胁而加强了相互支持;另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以及自由选举时代的到来使得教会和国家扩展了合作手段和领域。笔者认为,维持国家与科普特社群之间庇护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分别是教会作为经纪人的垄断地位以及双方的互惠关系。

三、科普特教会作为经纪人的垄断地位

庇护关系根源于社会分层的模式中,它在纵向上将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同个人连接起来。在稀缺型社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庇护关系可以通过有限资源的交换,向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帮助和社会流动,从而在不平等的庇护者和被庇护者之间构造一种控制关系。^①因此,这种控制性的庇护主义结构是建立在地位、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在庇护者——经纪人——被庇护者的三边结构中,庇护者由于缺乏直达底层的沟通渠道,必须确保经纪人对于被庇护者的权力垄断,以通过经纪人有效控制被庇护者。穆巴拉克执政期间,政府通过实行强化教会在科普特社群内部权力的制度设计维持了国家——教会——科普特大众的三边结构的相对稳定。

在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后,科普特人长期作为政府雇员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是埃及政治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起,部分科普特世俗精英阶层成为埃及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群体之一,他们常常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政党领袖、议会议员,其中不乏布特斯·加利帕夏这样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②然而,纳赛尔时期的社会主义政策严重削弱了科普特世俗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首先,从1880年到1953年,埃及100个最大的地主家族中40多个都是科普特家族,在上埃及,这

^① Rene Lemarchand,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Ethnicity in Tropical Af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6, No.1, 1972.

^② Vivian Ibrahim, *The Copts of Egypt: Challenges of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NY: I.B. Tauris Publisher, 2011, pp.18-19.

一比例甚至更高。科普特基督徒拥有埃及最重要的制造设备、大型零售企业、船运公司、保险业以及银行业,他们的势力遍及埃及各个关键商业组织。^① 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进程剥夺了这些富裕家族的财产和经营渠道,使大多数曾经依靠家族财富和势力的科普特政治活跃分子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其次,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纳赛尔取缔了革命前存在的一切政党和民间活动组织,以防止旧政客和国内反对派颠覆政权。由于在国王时代,科普特世俗精英对国家和教会改革的参与主要是依托于政党和民间组织,这一政策使他们失去了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平台。

伴随科普特世俗精英权力的衰落,科普特东正教会的政治角色得到加强。首先,科普特世俗精英曾经是科普特社群内部代表普通大众制约和监督教会的主要力量,在教会改革、宗教资产管理、社会组织监管以及科普特人“个人身份”法律事务方面具有重要发言权。但是在纳赛尔实施改革政策之后,科普特世俗精英的弱势地位导致社群缺乏从内部推动教会改革和监督教会的力量,教会权力失去制约。其次,尽管科普特人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的公共生活,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以及文化倾向,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浪潮面前,科普特教会成了科普特人在公民身份之外显示宗教属性的唯一象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社群的代言人。由此,科普特东正教会成了政府和科普特社群之间的唯一经纪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特许政策保证了教会在科普特社群内部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

(一) 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

1984 年,穆巴拉克恢复了多党制议会选举,但是埃及宪法禁止成立任何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科普特人一直没能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俗政党。^② 因此,在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大众只有两条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人民会议议员和在政府职能部门中晋升高位。穆巴拉克政府视教会为科普特人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和教会共同决定在其控制范围内参与政治活动的科普特人选,政府在阻止科普特世俗精英获得国家实权,以保证科普特东正教会在社群中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

首先,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严重削弱了科普特世俗精英的社会动员能力,科普特人无法再通过家族力量来支持自身选举。此外,尽管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内的人口数量可观,但是他们在任何一个省区都不占绝对多数,即使在科普特人密度最高的艾斯尤特省,科普特人也只占到了全省人口的 17%

^①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Nasser t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4.

^② Paul Rowe, "Building Coptic Civil Society: Christian Groups and the State in Mubarak's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45, No.1, January 2009, pp.111-126.

(见图 1)。鉴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教派因素已经深入到埃及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任何科普特独立参选人来说,在全国任何一个省区要想胜选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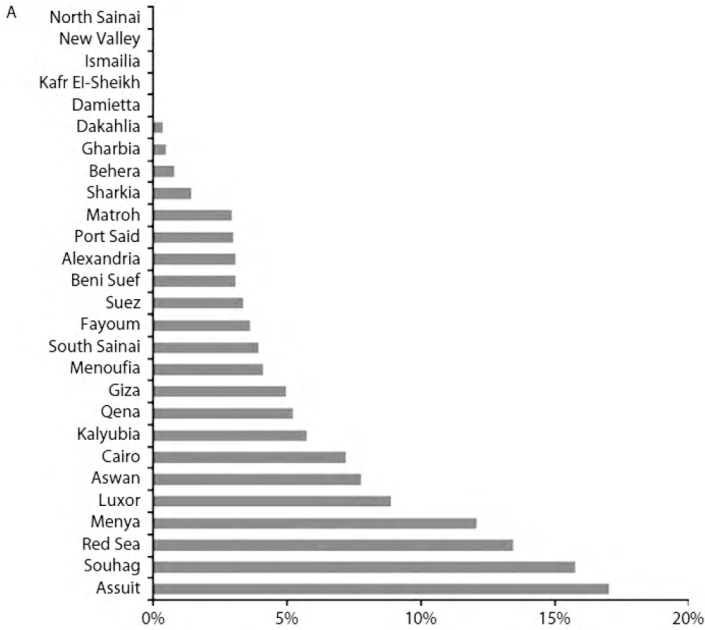


图 1 埃及各省科普特人比例^①

为了解决人民议会中缺乏科普特代表的问题,纳赛尔开创了政府任命科普特议员的传统,即将议会中的固定议席保留给政府指定的科普特人。而该传统也就成了政府保证教会政权垄断地位的手段之一。在人民议会选举结束后,穆巴拉克政府总理会要求教会大主教列出人民议会科普特议员候选人名单,政府再从中挑选任命议员。^②

其次,穆巴拉克政府还将科普特人技术性地排除在国家实权部门之外,以防出现拥有国家大权的科普特政治人物威胁到教会的政治垄断地位。在国王时代,科普特世俗精英由于身居政府高位,拥有影响国家对科普特社群政策以及直接向统治集团进言的实力,他们主导了科普特社群的话语权,将教会的政治作用边缘化。穆巴拉克时期,尽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科普特人数量庞大,但

① Qscience connect, *Characterizing the Copts in Egypt: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Health Indicators*.

② Mariz Tadros, "Vicissitudes in the Entente between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Egypt (1952-200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41, No.02, 2009, p.273.

极少有科普特人出任高级行政职务。政府希望由忠诚的穆斯林组成国家的“核心”部门,某些高级行政职务仅仅为穆斯林保留,科普特人永远不可能被提拔到那些职位。^①此外,在政府任职的科普特人大部分存在于技术性部门,他们被政府排除在军队和警察等实权部门之外。(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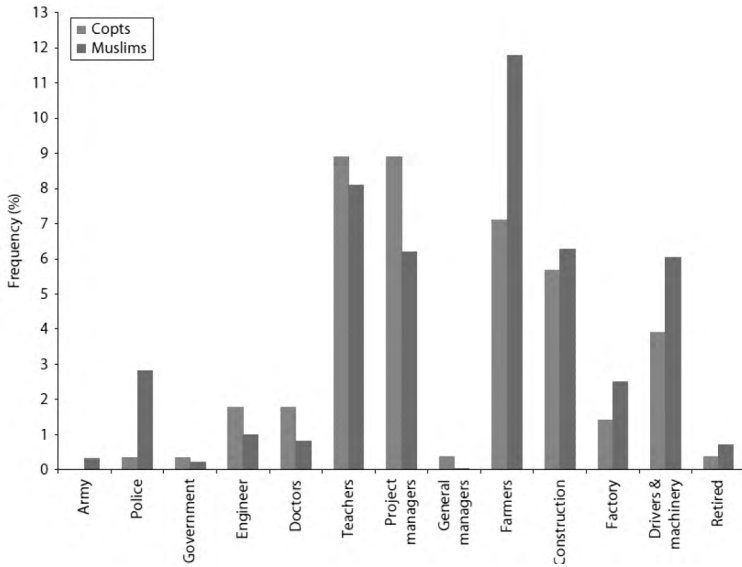


图 2 埃及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职业分布图^②

(二) 司法权力的垄断地位

在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时代,埃及的司法系统极为复杂,它由多个司法机构和法律体系构成,包括专门审理外国人的法庭、国家的世俗法庭、伊斯兰教法法庭以及针对非穆斯林的“个人身份”法庭。“个人身份”法庭的设立源于 1856 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马吉德一世颁布的“胡马雍御诏”,它规定帝国境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法律地位上都平等。各非穆斯林社群宗教机构从国家手中接管本社群司法事务的裁判权,在社群内部设立专门法庭,按照本宗教法律处理非穆斯林婚姻、继承等“个人身份法”相关的民事事务。^③自由军官革命后,纳赛尔曾经宣布废除国内所有分治的法庭以统一全国司法系统。但是宗教社群处理内部“个人身份”相关法律事务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纳赛尔之后

① Ali Zeynel Gökpınar, *Coptic Ethnopolitical Mobilization on the Road to and beyond 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M.A Dissertation, of İstanbul Şehir University, August 2012, p.55.

② QSCIENCE CONNECT, *Characterizing the Copts in Egypt: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Health Indicators*.

③ Bruce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40.

的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于埃及。^①

穆巴拉克政府承认科普特东正教会对科普特社群“个人身份”事务的司法管辖权,以此强化教会在社群内部的司法垄断地位。对于科普特人来说,“个人身份”事务中的离婚案件是尤其敏感的。根据宗教法律,科普特东正教会禁止信徒离婚以及和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结婚。而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穆斯林男子可以娶教外女子,所生后代属于穆斯林,而异教男子若想娶穆斯林女子,则必须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通婚现象导致大量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教会因此不得不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以防止人口本已不多的信徒流失。现在,科普特人婚姻案件已经成为当代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最主要原因。^②

近年来,科普特人的婚姻案件屡次成为埃及教派冲突的导火索。2004年12月,一位科普特神父之妻瓦法·康斯坦丁试图通过放弃基督徒身份和丈夫离婚。她离家出走后,向国家的世俗法庭申述离婚。教会引述《个人身份法》中的宗教自治权向政府强烈抗议。穆巴拉克政府最后决定将她交给教会,教会称自己成功劝说她维持基督徒身份。然而坊间传言,瓦法其实想改信伊斯兰教和丈夫离婚,只是被教会软禁无法实现意愿。随后,开罗伊姆巴巴区爆发了科普特人和激进穆斯林群体的暴力冲突。^③

穆巴拉克政府对科普特世俗人士参政的控制和对科普特教会司法自治权的承认,强化了教会在社群内部事务中的绝对威信。通过将教会树立成为一个稳定的经纪人,作为庇护者的政府可以在操纵国内教派话语权的过程中,利用教会在社群内部的动员能力和劝说能力。

四、政府与教会间的互惠关系

总体上,庇护关系被看作是具有不平等权力的人们,通过利益和友谊的纽带实现互动,从而实现他们各自利益和目的的机制,庇护主义是分析传统社会中交互关系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模式的庇护主义,自然也成为政治生活中实现交换的重要机制,它构成了非正式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党对庇护机制的利用来看,庇护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激励制度——一种购买政治

① Rolan Berger, “Public Policy and Islamic Law: The Modern Dhimmi in Contemporary Egyptian Family Law,”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Vol.8, No. 1, February 2001, pp. 94-97.

② *Personal Status Law in Egypt, Q & A,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Egypt)*. Available at <http://www2.gtz.de/dokumente/bib-2010/gtz2010-0139en-faq-personal-status-law-egypt.pdf>

③ Marita Lehnert Haakenstad, *The Discussion of Coptic Issues in the Egyptian Media, after the Revolution- sectarian and Polarizing?* M.A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Oslo, May 2013, p.47.

活动和政治反应的政治通货。^① 庇护结构对于执政者而言主要功能在于:维持政府的行政效力、推动社会团结、吸引投票者和支持者、协助执政党及其候选人、谋求对政府有利的民间活动、在政策过程中维护政府的威信等。庇护主义对于现代国家权力顺利地扩张到社会基层具有重要的意义。穆巴拉克执政期间,政府保证了科普特东正教会对科普特社群提供安全保护和社会资源。作为交换,教会在政治立场和教派问题上绝对支持穆巴拉克及其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从而形成了庇护主义式的互惠关系。

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多种因素导致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开始缓和。首先,随着埃及国内伊斯兰武装组织对政府以及科普特社群的威胁不断上升,政府和教会有了共同的敌人,从而放弃了从前的对抗政策。其次,穆巴拉克政府不再效仿萨达特竭尽全力与以色列媾和的政策,而是转而恢复了泛阿拉伯的反以口径,这与教会的立场十分吻合。第三,科普特东正教会大主教欣诺达三世意识到海外科普特人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对教会本身也是威胁,因此开始减少通过海外科普特团体的游说向埃及政府施压的行为。^② 在欣诺达三世被释放之后,政府和教会达成了“策略性的协议”,在纳赛尔和西里尔六世之间存在政治默契得以重新恢复。在这样的协约关系中,大主教决定对政府采取非对抗的策略,以换取政府结束对他的软禁以及恢复大主教与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及展开科普特相关事务的广泛合作,如惩罚暴力分子、建设和修缮教堂等。

(一) 教会的政治支持

科普特东正教会大主教欣诺达三世不仅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个人对穆巴拉克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党的支持,而且还将这一政策贯彻到整个教会的神职系统。2005 年的总统选举,穆巴拉克准备谋求第五次连任埃及总统。大主教不仅号召所有科普特人投票支持穆巴拉克的再次提名,还通过教会命令所有神父必须在大选中对穆巴拉克投支持票,由大主教领导的教会枢机会议也颁布了官方声明支持穆巴拉克。^③ 科普特东正教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教力量来展现对穆巴拉克政府支持姿态。2005 年穆巴拉克再次当选总统,枢机会议命令全国所有教堂敲钟以示庆祝。然而,根据东正教传统,教堂只能在进行弥撒和其他宗教仪式时敲钟。枢机会议的命令公然将教会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掺杂在一起,这无疑模糊了教会对自身宗教和政治权力的界限。在 2005 年

① Robert R. Kaufman, "The Patron-Client Concept and Macro-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6, No.3, 1974.

② Nabil Abd al-Fattah, ed.,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in Egypt*, Cairo: Al-Ahram Centre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95, p. 94.

③ Mariz Tadros, "Vicissitudes in the Entente between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Egypt (1952-2007)".

的人民议会选举中,科普特教会领导层号召所有信众统一投票给民族民主党候选人。在某些教区,即便执政党的竞争者是基督徒,神父也会公开督促信众投票给执政党的穆斯林候选人。比如,在上埃及的明亚省,教会劝导信众把选票投给执政党的候选人而不是大会党的基督徒候选人。这样的情形在全国各个选区不断发生。

欣诺达三世对宪法修正案的态度同样接近民族民主党的立场。2007年,穆巴拉克提出修改宪法中某些已经过时的条款。反对党则表示,一些修正案旨在限制政治自由以及削弱其他党派挑战执政党的实力。由此,来自反对党的议员抵制了人民议会关于通过修正案的投票。反对党和其他政治力量还发起了全国性的运动,号召埃及公民不要参加2007年3月26日的全民公投。当时,执政党急需公民参与投票以展示宪法修改是由大多数公民民主投票通过的。欣诺达三世及时地要求所有科普特人参加宪法公投,所有主教都被命令在各自的教区动员信众参加投票,并且在教会活动时发表支持公投的官方声明。为了树立典范,欣诺达三世本人投票时,在投票站发表声明强调埃及人支持公投的重要性,是为了“实现属于所有人的自由、稳定、民主和发展”。^①

在公投举行的前几个月里,关于宪法第二条的争议持续升温,政府坚持“伊斯兰教是国家的宗教,阿拉伯语是国家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来源”的立场。而支持修改宪法第二条的人认为,埃及是一个宗教多元的世俗国家,任何提及“伊斯兰教法是立法主要的来源”的宪法条文应该被删除,特别是埃及1923年和1953年的宪法都没有提到这样的内容。欣诺达三世此时挺身而出支持政府的观点,他作为宗教少数派领袖的表态对世俗主义的论点打击重大,而在萨达特时代,欣诺达三世曾经十分激烈地反对过该宪法条文。为了支持政府,他转而表示,问题的关键不是宪法文本而是具体施行,因为大多数埃及人都是穆斯林,他们有权让伊斯兰教成为国家的宗教和立法来源,而伊斯兰教也同时保障了非穆斯林的权利。^②

(二) 教会打压内部反对派势力

欣诺达三世对在大选中未支持穆巴拉克的神职人员处以惩罚措施,这表明他在教会内部清除穆巴拉克的政治反对派。菲洛帕提尔·贾米尔是在开罗穷人聚居的郊区工作的神父,他同时也是“明天党”的成员,该党领袖艾曼·努尔在2005年总统大选中参选,与穆巴拉克竞争。欣诺达三世为此冻结他作为神父的资格长达两年之久。尽管这一决定是以枢机会议的名义作出的,但是这并

^① Paul Rowe, “Building Coptic Civil Society: Christian Groups and the State in Mubarak’s Egypt”.

^② Mariz Tadros, “Vicissitudes In the Entente between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Egypt (1952–2007)”.

没有经过枢机会议审议,仍有违教会法律。^①

科普特社群内部也存在批评欣诺达三世毫无条件地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的声音。不同的科普特团体对欣诺达三世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表示了批评。其中来自科普特“世俗运动”成员的批评最为激烈。他们是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立场的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第一次是在 2006 年 11 月讨论世俗人士对教会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次是在 2007 年 4 月讨论教会审判和科普特人对公民社会的参与。在这两次会议中,许多发言者都表达了对教会政治作用的担忧,一是教会对信众的指导和影响会导致科普特人更加服从政府而不是成为独立的公民,二是害怕科普特社群被教会立场挟持而招来普通穆斯林的反感。^②

更加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海外科普特团体,他们指责欣诺达三世将科普特社群出卖给政府。美国的“科普特美国人协会”是坚定维护埃及和科普特人权利的游说团体,他们指控欣诺达三世“对保护科普特社群无所作为,相反,他将自己与埃及政府的罪恶行径联系在一起,并为他们掩盖罪行。他无耻地讨好和协助埃及政府摧毁科普特文化,通过不停的迫害、威胁和渗透让科普特社群的安全和未来毁于一旦”。^③

这些批评的声音同时威胁到了穆巴拉克政府和欣诺达三世领导的教会的威信。作为反制措施,教会通过科普特社群“教士化”进程来打压内部反对政府和教会的声音。1980 年,欣诺达三世委任神父穆萨作为科普特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分管青年事务的主教。通过设立青年主教公署,将民间自发的《圣经》学习青年小组收归到教会监管之下。^④ 教会还组织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鼓励科普特世俗人士参与其中,无形中将他们容纳到教会体系之中。到 2010 年,由于受到青年主教公署活动和志愿服务影响而进入的教会神职系统的有 1 个主教、4 个神父以及 25 个执事。^⑤ 与此同时,科普特东正教会在全球五大洲都驻派了主教,全球共有 450 个海外科普特教堂,^⑥它们都成为大主教与海外科普特社群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机构。

① Rustum, Rasmi ‘ Abd el-Malik, and Ishaq Ibrahim ‘ Agban. Qadasa al-baba Shenuda al-thalith wa hisad al-sinin. Vol.2. Cairo, Institute for Coptic Studies, 2008, pp.137-147.

② Mariz Tadros, “Vicissitudes in the nente between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Egypt (1952-2007)”.

③ 2007 年 3 月 20 日美国科普特美国人协会声明, <http://www.christiannewswire.com/news/367392535>

④ Sanaa Hassan, *Christians versus Muslims in Egypt: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for Coptic Equality*, ch.12.

⑤ Pietermella Van Doorn-Harder, MajdiJirjis,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optic Papacy*, p.178.

⑥ Ghada Botros, “Religious Identity as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Coptic Orthodox Immigrant Church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9, No.2, June 2006, p.175.

（三）政府提供社会资源和安全保护

长久以来,埃及科普特社群的核心诉求在于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教派冲突中的安全问题,而这都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埃及的反对派极端武装卷土重来,在上埃及,它们针对科普特教堂和政府目标发起多次暴力袭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些极端武装组织杀害了多名安全部队成员和外国游客,影响了埃及国家旅游的经济收益。政府的反应是打压穆兄会和针对极端武装组织展开广泛的安全攻势,严密控制清真寺以监控和限制极端主义,这一行动使极端主义运动在社会层面受到压制。政府对境内极端分子的强力镇压缓解了科普特社群所面临的教派冲突的压力,特别是在袭击频发的上埃及地区。^①除了保护科普特社群免受极端分子侵扰,穆巴拉克政府还打出民族团结的旗号,宣称科普特人是埃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赋予科普特社群更多的权益。在2000年的议会大选中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科普特候选人明显增加,科普特人优素福·布特斯·加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新建教堂的许可也有所增加。此外,穆巴拉克宣布,科普特东正教的圣诞节1月7日为国家公共节日;国家宗教基金部部长设立了一个和科普特东正教会联络的专门委员会,以归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有化进程中被没收的教会财产;^②政府修缮了耶稣神圣家族在埃及的遗迹以供基督徒朝觐。

此外,穆巴拉克政府重视提高科普特东正教会和科普特社群的官方地位,以显示埃及宗教平等的形象。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设立“马丹杰特辛格推动包容和非暴力奖”,埃及政府提名欣诺达三世,使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个人。^③大主教还被邀请参加各类政府举办的官方宗教庆祝活动。每年穆斯林斋月结束时,埃及宗教基金部都会举办“民族团结开斋宴会”,欣诺达三世总会应邀出席,并与总理、议长、宗教基金部部长以及爱资哈尔谢赫并排上座。同样,在东正教复活节时大主教会迎来总理、内阁部长、政党领袖以及开罗和亚历山大省长的祝贺代表团。大主教和爱资哈尔谢赫经常会被同时邀请到会议和讲座上演讲。上述举措都被政府解读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在埃及地位平等且作出了同等重要的社会贡献,因为政府重视科普特东正教会的大主教,并使他享有和穆斯林宗教领袖一样的特权和地位。

^① Fiona McCallum, *Christian Religious Leadership in the Middle East*, p.145.

^② Cornelis Hulsman, “Christians in Egypt: the Impact of Islamic Resurgence,” *Religious News Service from the Arab World*, 2002.

^③ Fiona McCallum, *Christian Religious Leadership in the Middle East*, p.147.

四、结 论

庇护关系在国家的核心和边缘之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惠网络,通过庇护关系,政府政策的输出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得以协调和贯彻。庇护主义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均衡。庇护主义借助其内在的社会交换机制,通过实现互惠的结果从而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达成一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庇护关系存在期间的更大的社会均衡,这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

由于面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与和科普特社群的关系呈现出以教会为经纪人的庇护主义特征。作为庇护人,政府默许和支持教会对科普特社群的政治、司法垄断权,以稳固经纪人对被庇护人科普特大众的控制力。教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合作关系为科普特大众提供社会资源以及安全保护,以换取被庇护者对经纪人的政治支持。在此基础之上,教会代表科普特大众对穆巴拉克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最终形成了政府—教会—科普特大众之间的庇护主义三边关系。

A Study on Coptic Issue in Egy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entelism

DUAN Jiuzhou

(Duan Jiuzhou, Ph. 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Political clientelism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selective benefits to individuals or clearly defined groups in exchange for political support. As the largest religious minority in Egypt, the Coptic community represents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forces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epitomizes largely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Egypt. In Mubarak era,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accepts the autonomous hegemony of the Church over the Coptic community in return for political support and endorsements, thus establishing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ptic community based on mutual benefits. From patron-cli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has elaborated 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 mode in Egyptian state-church-community trilateral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Egypt; Clientelism; Coptic

(责任编辑:李 意)